

民国期刊与民众防疫心态批判

Criticism of the Masses' Mentality about Epidemic Prevention in the Periodical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杜敦科 /DU Dunke

(遵义医科大学贵州省高校人文医学研究中心, 贵州遵义, 563003)

(Research Center for Humanistic Medicine of Guizhou Colleges, Zunyi Medical University, Zunyi, Guizhou, 563003)

摘要:民国时期,疫病肆虐,致使民众苦不堪言,甚至导致丁尽户绝。大量期刊遂纷纷刊登防疫知识。在普及防疫知识的同时,许多期刊还对民众的错误防疫心态公开加以批判,引导公众树立正确防疫观念。各类期刊对民众防疫心态的批判对于提高民众的公共卫生意识,推动防疫观念更新,养成正确的防疫行为起到了积极作用。

关键词:民国期刊 民众 防疫 心态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ll kinds of plague were widely spread, causing great harm to the people. Therefore, the periodicals published many articles on plague prevention. In their support of the popularization of plague prevention, many articles criticized the wrong ideas of plague prevention, and in this way guided the masses in forming the correct concept of plague prevention. This kind of criticism helped to update the masses of epidemic prevention concept, and in this way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cultivating the correct epidemic prevention acts.

Key Words: Periodical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Masses; Plague prevention; Mentality

中图分类号: N0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5994/j.1000-0763.2020.03.002

五四运动前后,各种期刊成为推进科普活动的主力军。其中,许多刊物肩负起了普及公共卫生知识,特别是防疫知识的社会责任。孟群在《唯生汇刊》的《序引》中说,在“人口逾四万万的中国,呻吟于数千年封建制度之下的人民,卫生知识的浅陋,随时随地缺乏康健的南针,其需要卫生知识的灌溉真可谓迫不及待”。^[1]直接反映了社会大众亟需掌握医疗卫生新知识的客观现实。

但是,在民国时期,无论在传染病的发生与传播方面,还是在治疗与预防方面,社会大众还存在不少认识偏见及误解,这为防疫知识普及造成了较大障碍,甚至使防疫工作收效不佳。于是,各种期刊在普及防疫知识的同时,对民众错误防

疫心态予以揭示和批评就成为一对“组合拳”,进而推动了期刊在防疫知识普及中真正取得实效。学术界对民众防疫心态问题已有所关注,但研究成果主要从“现代性”角度探究民众在新的防疫体制和制度影响下卫生观的现代性表现,如胡勇分析了清末东北地区的鼠疫发生时的民众心态及其转变,^[2]张泰山关于民国时期国人对国家公共卫生建设的认识中也略有涉及。^[3]但是对国家防疫体系建设进程中复杂的民众心态关注不多,而这恰恰是严重影响防疫效果的重要因素。本文综合考察民国时期民众防疫心态的种种弊端,从一个“反面”视角揭示民国时期国家防疫进程的艰难与困惑。

基金项目: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民国期刊与传染病知识普及研究”(项目编号:15GZYB36)。

收稿日期:2018年7月6日

作者简介:杜敦科(1981-)男,山东青岛人,遵义医科大学贵州省高校人文医学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Email: dudunke@163.com

一、民国期刊与防疫

民国时期,传染病的流行非常严重。据医家所见:“疫症在中国,真如家常便饭,四时不息的流行着。每到春冬,各处必有天花、白喉、猩红热及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之流行,一遇夏秋,又必有赤痢、伤寒、霍乱之猖獗,此起彼伏,绝少休止。有时全国蔓延,像煞一个大循环,遍地皆闹着时疫;有时局部流行,或每年一发,或隔年一发,颇具周期性,而且情形往往很严重。有人推算,我国每年病死于各种急性传染病的,至少在二百万以上,牺牲不算不大。”^[4]面对肆虐的疫情,伍连德特别指出:“国家之积弱如故,社会之羸陋如故,何收获之功独觉单薄,盖即杂志不注重卫生,而医界不组织杂志也。何则杂志之目的,原在灌输智识,养成人民高尚之程度,以共图国是。”^[5]这一观点强调了期刊在国家卫生事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为防疫工作开展指明了一条出路。诸多期刊,特别是医学期刊遂纷纷加入科学普及队伍行列,重视防疫知识普及,推动了科普活动的开展。

《文医半月刊》在创刊号上发表了《疾病与卫生》短评,指出:“因即在国家不提倡,民众知识薄弱”“即疫疠流行,亦且误于迷信,而不省以卫生方面着手”。而欧美各国,卫生事业发达,国内疫疠甚少,人丁兴旺,虽老亦壮。所以文章认为,普及公共卫生知识,是“政府与民众所应注意者也”。^[6]《大众卫生》强调在普及防疫知识时,“文字必须浅明,我们要能将这种最专门的科学,能够用最通俗的文字写出来,使人人看了都懂得,这是最需要没有的了。简单的来说,就是要卫生的科学大众化,人人都明白,都懂得卫生的究竟”。^[7]《广西卫生旬刊》以内容通俗为办刊原则,“凡属于高深者,皆在摒弃之列”,由此而被人指为“内容欠佳”,但该刊“情甘拜受欠佳之咎”“完全为求普及多数人的医药卫生常识”而不改初衷。^[8]大略统计,当时出版的医药类科普期刊就多达50余种,而即使并非完全以普及医学知识为宗旨的刊物,也以多种方式开展防疫知识普及工作。如《国医正言》于1934年5月创刊后,自第二期始开辟“时症急救专栏”,为患疫紧急又聘医不及之家提供必要的急救指引。该刊曾在此专栏中刊登了《今岁时症之治法》《霍乱实验说》《暑月防疫急救运动》

《黄痢难治》《喉痧又起》《中西医莫忽视冬温》《中医公会防疫法》《痘症与牛痘史论》等诸多疫病救治验方。又如出版专号,《中华医学杂志》虽为医学学术性期刊,但也出版过多期专号,如1932年6月出版的第十八卷第三期为“疟疾专刊”,1937年3月的第二十三卷第三期为“结核病专号”,1940年12月的第二十六卷第十二期为“公共卫生专号”。《广西卫生通讯》在1942年6月出版的第三卷第六期为“霍乱防治特辑”。《卫生杂志》在1933年5月出版的第八期为“性病专号”,1933年6月的第九期为“时病专号”,1933年7月的第十期为“续时病专号”,1934年6月的第十九期为“公共卫生专号”。《中国医药月刊》在1942年7月出版的第三卷第一期为“疟疾专号”,等等。

在防疫知识普及方面,期刊所涉内容甚多,主要有对传染病发病原因及传播途径相关知识的普及,对传染病症状及其危害的知识普及,对传染病治疗知识的普及以及对传染病预防知识的普及等。1931年,林椿年在《现代医药》发刊词中说:“年来吾国医药界出版的刊物,正如春笋勃发,对于卫生行政,加以批评者有之,对于社会民众,灌输通俗医药或卫生常识者有之,对于旧医药之谬误,予以矫正者有之,对于医药教育,发表议论者有之,……这是我们同志们的努力同进步的地方,很值得我们钦佩的。”^[9]也有期刊编辑针对期刊的普及效果评论说:“卫生医药刊物的风行,尤其收效不浅。”^[10]总之,期刊为防疫知识的普及发挥了积极作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家防疫事业的发展。

二、民国期刊对民众防疫心态的批判

普及防疫知识是民国时期许多期刊的传播重点,但知识的有效传播并非轻而易举。许多医者和编者敏锐地发现民众在防疫知识接受中存在的心理和观念上的障碍,严重阻碍了防疫知识的有效吸收。有医生分析原因时说,民众“昧于卫生知识,要亦不失为最大之因素”。^[11]为配合防疫知识的普及,许多期刊对民众的错误防疫心态予以揭露和批评,指导公众树立正确防疫观念。

1. 批评民众缺乏公共卫生意识

传染病是人类公敌。有人指出,在传染病爆发时,“不第中下阶级人民,多供其牺牲,即平日

养尊处优之上流社会，以及号称先觉之智识阶级，染者亦不少”。^[12]因此，防治传染病需要万众一心、同心协力。但是，民众的不良习惯对传染病的预防造成了不少消极影响。如有的人对个人卫生较为讲究而对公共卫生则漫不经心，所以到处可见脏水秽物随意处置的情形，“一般人心理，以为这些东西只要离开自家的眼前就行，送到街上，管他臭了谁呢。不知公共的卫生不讲，个人卫生也讲不成”。^[13]1934年的《防痨》杂志发表《平凡的，也是严重的》一文，专事批评民众忽视公共卫生的行为。文中还特意提到一段对话场景：甲孩：喂！公共汽车上是不许随便吐痰的。乙孩：干卿底事。甲孩：你妨害公共卫生，我就有权干预。乙孩：别人不响，为什么偏偏要劳你尊口呢？通过这段对白可见，不少民众对维护公共卫生意识还是非常淡漠的。

个人卫生与公共卫生有密切联系，当一人患病，其他人都是潜在的患者。因此，防疫当从自身做起，积极预防和治疗。作为患者，积极治疗才不至在更大范围内影响社会；作为健康的个体，也不能高枕无忧而推卸公共卫生建设之责。郭志坚在谈到救济麻风病人时曾说，我们是否有担心自己的家人永远不得麻风病？我个人现在与麻风病无缘，安知五年十年之后不被感染？安知我们的子子孙孙不感染此症？“欲保绝对安全，只有一法：即将麻毒斩草除尽”。“这样说来，救济麻风岂非就是保护我们自己和家人的人么？”^[14]还有人说：“直接救济麻风病人，即间接救济自己。”^[15]诸种言论，传递出传染病具有普遍危害性特征，告诫民众在传染病面前没有绝对安全，打破了民众把个人卫生与公共卫生截然两分而只顾独善其身的错误观念。所以，当传染病肆虐之际，“正经的话，还是要上下一致通力合作的谋如何防疫，如何治疫”。如政府方面应推行卫生行政、拨款救济；医务人员应当仁不让而热心防疫；温饱之家、地方士绅应捐款施医、救济病黎、倡办防疫；贩夫走卒应取缔肮脏食物，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只有大家共同努力，“各具与疫魔不两立之决心”，才能战胜疫病。^[16]

2. 批评民众对科学防疫的冷漠与误解

由于民众科学知识缺乏，对医疗卫生知识知之甚少，所以每遇疫情，或求神问卜，迷信盛行，或依赖土方偏方，讳疾忌医，对科学的防疫方法

漠然视之。如1933年，一位自命知识阶级的士绅面对一辈故旧宣讲时说：“什么叫细菌，不过是学医的人张大其词罢了。若果真有细菌，为什么那年我们城内大闹其瘟病，我们全城的人没有法子，立即提前过新年，说也奇怪，那流行广泛的温病，顷刻就停止进行了，难道说细菌怕过年吗，可见细菌说，也不见得十分可信，退一步说，即许有细菌，细菌一定有眼睛，也许不会乱害人。”^[17]科学防疫必须从提高民众的医学知识水平开始。当时著名公共卫生专家胡宣明曾大力呼吁，中国的公共卫生建设必须依靠科学。他举例说，在中世纪黑死病蔓延之际，欧洲人虽想出了奔走呼号、隔离病人、断绝交通、焚烧房屋等办法，但因科学知识缺乏，终究效果不佳。而现在，必须遵循巴斯德的微生物学说，做好调查研究工作，以科学的方法推动公共卫生事业发展。^[18]广西记者克西曾被梧州医院派往信都县参与种牛痘工作，据其介绍，当地人对种痘并不认可，原因是他们小的时候就曾种过天花痘，天花痘也称“鼻痘”，即取患者的疮痂，研成粉末，吹入接种者的鼻腔，数日之后，接种者即满身发生天花。这是一种人为的“出天花”免疫法，但风险大，有很多孩童因此而死亡。所以种天花痘是一种比较危险的预防办法，后被种牛痘取代。由于信都当地人对种天花痘心有余悸，在“他们脑里有这样恶印象”，认为种痘并不能预防天花，因无知而“不相信这简简单单的几个牛痘可以避免天花”。据这位记者所说，其在城内施种时，最初两天“完全没有人来光顾”，后召集各乡镇村长和小学教员帮助宣传，并派遣镇工作人员摇铃宣喊，才有人来接种，最终在该县四万多人中，仅有1187余人前来接种。^[19]还有人认为打防疫针没有必要，甚至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有生以来，从没有打过防疫针，可是也从没有病过时疫，所以我们何必拿好皮肉去打什么防疫针呢！……总之，生死是命定的，时疫是天注定的灾难，防疫针怎么能够预防得了呢！”^[20]正是固守着先入为主的错误认识，所以缺乏对现代防疫科学的认同感，因不认同进而导致排斥。

1938年《上海儿童》刊登的漫画《打过防疫针后的小林》也反映了人们对防疫针功能的认识误区。小林以为“我已打过防疫针，一切都不怕了！”“接近患疫病的人也没有什么关系”“食物不洁也可吃了”“露宿也不妨了”等等，结果小林

还是患病入院了。最后画作者指出:“一般小朋友们,往往以为注射了防疫针,好像获得了无限保障似的,什么都不怕了”,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见解,须知注射防疫针固有相当的效用,但这只是增加体力上的抵抗力罢了”。^[21]1942年《中国漫画》刊发的漫画《防疫针下之逃避者》刻画了老王因害怕打霍乱防疫针而逃避,并且还从他手中购买了一张防疫证明书,以为可以蒙混过关。但在罹患霍乱后,仍须前往医院接受注射治疗。一张虚假的防疫证明书并不能给老王以疾病豁免权,患病后的他也只有及时就医、科学治疗才有活路。这些漫画告诫民众,必须正确认识预防注射的作用,对科学的防疫方法不能掩耳盗铃、懵懂无知。

3. 批评民众忽视病情、拖延治疗

任何传染病若能早发现、早重视、早治疗,总有挽救的希望。但在当时,社会大众对传染病的防护不到位,重视程度不够,往往有不少患者错过早期发病阶段的治疗黄金期,最终延宕至病重。《卫生杂志》第2期刊登了一幅漫画,老虎从笼舍里挣脱而出,追赶人群,寓意养虎为患,防不胜防。漫画旁边注释曰:“有小病听之不治,好比养虎贻害,后悔莫追”。形象地说明了有病须及早就诊的道理。许多期刊大量发文呼吁民众重视自身健康,特别是有传染病接触史的人员应密切观察自身健康状况,做到早发现、早治疗。及早发现并积极治疗,“若使患病不深,从早诊治,铲除为害之点,增加抵抗能力,则细菌之毒素仍可阻遏,而其病躯亦可以康复。倘任之听之,毫不省察,罔知改良习惯,适用环境,则必渐趋险恶,甚至极端危急”。^[22]早发现早治疗还须对传染隐患作出准确判断。有文章提醒,假使家中已有痲病人,“一个痲病人的家族,或其同伴中,往往有新得着传染的初期病人在里面,如能及早发现,那么,就容易把他治愈。一个人得着了痲病,好比是一间房子失了火如的,不可等到烧得不可收拾的时候去救。痲病到了第三期是不容易治愈的,倘若是第一期的痲病,当然有十分的希望,可以治愈。”^[23]

古代的痲风病院只是一个被动的隔离场所,曾被称作“绝望岛”“活死人的居留地”。但随着医疗手段的提高,近代痲风病院的功能有了较大变化,不单是隔离场所,也是救治场所。《痲疯季

刊》主编邬志坚为改变病人的固有认识,曾反复撰文强调痲风病院有能力救死扶伤,是“病人少感痛苦而多得实益”的地方。^[24]但是,因痲风病在初期发病并无痛苦,患者容易忽视治疗,最终拖延至不治,早期患者进入痲风病院治疗者寥寥无几。长期参与痲风病救治的傅乐仁医师曾批评道:“在中国的困难情形,却缘痲风人太大意,不到衰弱残废极点,不求外助,命运之说,深入人心,一切听诸天命,任其自然,待其受毒已深,不复能为人,辗转沟壑,死而后已。”^[25]在当时,由于对疾病危害的重视程度不够,导致隐匿病情耽于治疗者确实屡见不鲜,许多期刊针对民众讳疾忌医的表现加以批评和指正,为的是避免病人“把可以医愈的时期失去”。^[26]

4. 批评民众面对疾病消极遁世

人的精神状态对于身体健康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个人若有乐观的生活态度,则即使有点病痛,也有利于痊愈,但“假使一个人是抱一种悲观主张的,则必定会有相反的结果,那么本来是一个康健的人,也会因此而生病的”。^[27]所以说,在疾病面前,保持积极的心态特别重要。《防痲》杂志曾刊登过这样一段情景对话:女同学:听说福祿寿同学近来很是消极,他说他带了灰色眼镜,什么都绝望,不但不愿继续念书,而且觉得学校里、社会里,都好像是个囚笼似的。男同学:他老是这样,实在不是好现象。医生说他的痲病很坏,要静心摄养,切不可胡思乱想,如果他遇事悲观的话,不但不会好,一定加剧了!女同学:我时常劝他,但他是左耳进,右耳出的。同学中,你算是和他最知心的,就去好好地奉劝一番吧。两个月后。女同学:福君怎么啦,好了没有?男同学:完全无效,他积郁与世长辞了!女同学:悲观、消极,真不知戕害了多少青年。唉!^[28]这则对话的主旨就是劝告人们,若不幸患病后,应勇敢面对,积极治疗,而不是消极遁世,积重难返,最终坐以待毙。在痲风病的救治方面亦当如是。医务人员特别强调痲风病人的精神健康问题,认为“人当百无希望,众恶共弃之时,必至放纵无羁,自甘堕落,征诸痲风病人之生活,而其言益信,既营救其肉体之创伤,又安忍其心灵之陷溺”。^[29]

在民国时期,医德高尚的医生对于精神慰藉特别看重,时刻给予病人鼓励和信心。有医生说:“病人在极度痛苦与失望之下,身体各器官的机能

减退，对于病人的抵抗力愈加薄弱，同时一个人已经失去自己疾病痊愈自信力的时候，对于平素摄生自然而然的疏忽起来，消极起来，结果也可以使疾病每况愈下，所以患者的意识与感情的确可支配疾病的好恶。慢性肺结核患者，多半精神非常的过敏，医生对他一句普通的言语或者随便一种与他漠不相关的表情，会使他误解是医生对他宣布死刑。”在这个时候，良医的责任是鼓舞士气，“打破病人的沉郁与悲观，鼓起病人的自信力，其效果之大倍于药物”。^[30]

患者不仅要有乐观的心态，还应有人道主义精神。当自己患病时，应及时隔离救治，而不是隐匿病情、害人害己。《麻疯季刊》曾批评了广东清远麻风船（患者被要求在水面生活，每人一只船）上的女麻风病人引诱朝山进香的男香客而致使不少香客被感染的实事，“这种野蛮的举动，无非传布麻风的毒害，使他越发猖獗”。^[31]《广西卫生旬刊》也对1934年11月东北地区爆发鼠疫时，“满人染疫，辄不报告，且更深入内地，以逃避卫生员之干涉”的行为加以批评^[32]，认为这给内地带来极大隐患，可能造成疫病大爆发。《公共卫生月刊》还特发短论，呼吁对于痲病疗养院的健康教育应增加“陶冶推己及人的美德”和“自动的戒避与他人共用饮食用具及与亲友接吻”等内容。^[33]

5. 批评民众因循守旧、痴崇迷信

在传统社会，公众多为传统旧俗所束缚，不顾疫情发生而随意交通、走亲访友、探亲看望，增加了疫情扩散蔓延的风险。有的文章针对高发于春节期间的流行性感冒、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天花及猩红热等“春令病”提出预防警告，认为若“亲友家里如果知道有这种病人，最好暂时不要来往。不要只顾无谓的应酬，如他来拜年，我不去回拜，怕恐得罪于人，殊不知如果顾了无谓的应酬，难免要拿身体去牺牲，岂不是太不值得呢？”^[34]又如，当家人罹患传染病时，正确的做法是，“不问是父母子女，不要学那愚孝溺爱的旧套，亲自去服侍他，最好送到医院里去住院，省得传染自身”，亲友间有这类病人，也“不要只顾无谓的应酬”而探访。^[35]

迷信与愚昧是普及传染病知识的重大障碍。由于人们迷信传染病是鬼神所致，在预防上也往往陷入迷茫之境。如发生于1918年山西北部的鼠疫，使当地城市和乡村的大部分人被感染而死亡，

但未被传染者却认为这是“有鬼神谴责”“由于鬼神作祟”。所以“有些家庭，往往不信任我们使者的话，或对于他的叮嘱不加注意，于是疫乃继续发生，使这家庭中的大部分死亡”。^[36]1932年，陕西枸邑县发生霍乱疫症时，当地民众盲目应对，“一手遮其鼻腔，一手持有香表，东奔西跑，求神保佑，有者门悬草人、红裤、白碗等形形色色，实为奇观”。^[37]上海的中医庄懋樵曾遇到一位病情危急的湿瘟症病人，虽为其开药一剂，但未及服用便出现热势大炽、呓语症状，其母遂请人超度，至第二日患者神识复清，其母由此以为“祈祷有效，反不延医服药”，结果是日黄昏便毙命。^[38]无独有偶，广东江门潮盛村的谭文康家也因迷信妖巫而致使其女病亡。谭的女儿新意染病后，其父母非但不延医治疗，反而不惜重金请妖巫做法禳解，最后导致新意不治身亡，其父母得到了“迷信鬼神者应有之果报”。^[39]《时事周报》的记者对民众的种种迷信活动批评说：“瘟疫降临，竟有迷信神权之徒，燃灯以禳灾，甚或迎神出驾，意可驱瘟，缘木求鱼，愚不可及。”^[40]总之，民国时期，人们以迷信方式应对传染病、不问医生问鬼神的现象比比皆是，酿成了一幕幕人间悲剧。很多期刊遂以此为话柄，以期讽一劝百。

6. 批评民众慌不择医、胡乱投医

面对传染病，不少民众因极度恐惧而慌不择医，不仅于救治上无补，且易导致病情加剧，影响治疗。如“大都会有钱的人，也是因为无医药的常识，一遇家人发生疾病，是中西并用，杂乱投医，本是不应死的病，反把治疗期延误了”。而在乡村，情况更甚。一遇有病，要么“用那气死名医的单方”，要么“请个医生来，多是一知半解的，人死了还说他命短呢”。^[41]针对这种较为普遍的悲剧，有医生就指出：“杂药乱投不可救，而卒至于死者，非皆其病之不可治也，误服其药而致死者过半数也。”^[42]《麻疯季刊》讲述了一位麻风患者丁老八从不承认自己得了麻风病到后来无奈面对现实，且自己胡乱用药而终至不治的悲惨故事。丁老八意识到自己患上麻风病后，为时已晚。于是，“便有许多人介绍治大麻风秘方”，他先是用端午节晒干的雄壁虎研末与热黄酒冲服，未见疗效后，“不得不再吃别的药方，毛羽、化湿、草木、金石、酸甜苦辣腥臭，只要人家说一声‘灵的’，他终必尝试了才肯死心”。^[43]当意识到病情严重时，患者

的求生渴望促使其对治疗已经不择手段了。

还有的患者就医心切但又对医者的业务水平和声誉不辨是非、不问真假,往往因道听途说而胡乱投医,“今天甲说张医生好,便就张,明天乙说李医生不错,便去就李,其实在甲和乙也未必真晓得张好李歹”。^[44]所以,在就医时容易不得其人、误投庸医。1934年,中医周稣甫就曾愤而批评庸医害人的现实。他分析指出,国内肺癆病之多,“十之七八皆因误用凉药酝酿而成”,原因就在于“一般潮流之医,胸无定见,一闻病人自云内热,便随声附和,大施其清凉苦寒之品,及至愈服愈重,危而至死,病家认为命定,医家也不以为非”。^[45]庸医之害不亚于疾病之痛。《现代中医》曾敬告读者说:“时疫流行之际,病者乱投医院求治,不但于治疗上发生阻碍,稍一不慎,易致蔓延”。^[46]

7. 批评民众散布谣言、制造恐慌

疫情初发时,人们往往没有足够重视而忽略预防,当疫情蔓延开来后,人们会随着疫情的扩散而恐慌。这种恐慌体现了人的心理变化和求生欲望。但是,随着疫情的扩散,人为制造的恐慌和谣言也不断出现,加剧了人心紧张,甚至造成社会混乱。例如,民众对麻风病的认识长期存在误解,夸大其传染性,所以每逢麻风病疫情发生时,民众间便流传着“以为此症是极易传染的,假使向麻风病人望一眼,就可以传着这病了”等恐怖传言。^[47]这不仅制造社会恐慌,也导致对患者的极大歧视,在不同地方发生过官府捕杀麻风病人的惨绝人寰事件。又如,1935年夏季,日本爆发嗜眠性脑炎,消息经多家报刊转发而传至国内后,“国人以两国相距甚近,轮船往还至密,不无闻而色变。一般过敏者,遂抱相惊怕有之心理。最近平市,连续发现脑膜炎病人数名,一时以讹传误,遂认为睡疫。其实脑炎与脑膜炎病理互异,症状亦大不相同,绝无误认之余地。”虽经卫生当局调查后予以辟谣,但消息早已不胫而走,造成的“虚惊亦复不浅矣”。^[48]所以,近代医学家范行准非常精辟地指出:“我以为能消灭一种使人精神和肉体上发生痛苦的谣言,其功不在发明一种特效药之下。”^[49]

随着社会大众对疫病恐慌的加剧,极易引发进一步的社会混乱。如人们不顾传染危险而仓皇外逃,学校轻易做出放假决定等,这些做法其实并不能打消民众的顾虑和恐慌。如有人说:“但恐

怖是没有用的,我们须得要想个办法预防它,扑灭它才是。”^[50]现实中,要消除对疫病的恐慌只有按照科学方法加以预防和应对。例如,1931年东北地区曾爆发鼠疫,当地一所容纳了三百多学生的学校顿时陷入恐慌之中,人人自危。有人认为应该放假,更多的人则手足无措。在该校任教的周希文向师生们说:“最好是大家组织起来,共同防御鼠疫的传染!这病虽然厉害,如果大家都能加意防范,也是不能进入我们学校门墙的。”于是,他向全校师生讲述了这次鼠疫爆发的原因,并引导学生思考应该怎样预防,大家发言说,要减掉长指甲,要晒被子衣服,每天用沸水蒸煮餐具,及时把全校的鼠穴堵塞,禁止外人入校,不准出校,出校者不准返校,举行全校大扫除,用石灰水及石碳酸水洗刷墙壁和地面,等等。通过集思广益,全体师生都懂得了怎样从个人卫生和公共卫生方面加强防范,“学生好像壮起了胆子,三百多面孔的阴郁颜色,消失了一半”。通过这样科学预防,全校师生无一被传染,但据统计当时全城死亡人数达5300余人。^[51]六年以后的1937年,作者将其带领全校师生成功防御鼠疫的经历发表出来,很重要的意义就是告诉人们在瘟疫环伺之下如何处变不惊,从容应对。

三、结 语

民国时期,期刊在普及和传播防疫知识方面发挥了积极引导作用,甚至较之报纸也有明显优势。胡愈之先生曾讲到他在民国时期竭力办期刊的原因时说:“报纸记载太零乱,书籍则部头大,太专门,而杂志则恰恰可以适当地解决这种需要。……杂志编得快,销得快,价钱低,因此,杂志是能与群众建立密切关系的。”^[52]1931年1月《唯生汇刊》的出版就是编辑部充分考虑了期刊较之报纸的优点后决定发行的。《唯生汇刊》是由北京大学医学院唯生医学社创办的医学普及刊物。唯生医学社的文章最初是刊登在《北平日报》《益世报》《华北日报》上的,但编辑部认为这样随报出版受众较少,遂认为有必要独立于报纸之外创办一个专门性医学刊物,这才有了《唯生汇刊》的出版。再如,1935年4月1日,《现代中医》就曾刊登了一篇批评报纸讹误的文章。文章作者姜筠指出,2月22日,其读到上海的晚报中报道了闻

北地区爆发麻疹疫情,报纸说“该症治疗,极感困难,除隔离外,殆鲜其他适当之办法”。姜筠认为这种说法极不负责,不仅枉顾中医可以治疗麻疹的事实,而且造成社会恐慌,及对病人不公正的待遇。这种论调“印入了民众的心脑中,要起不良的影响,就是以后遇到了小人出痧子,将任其自病自灭,那后患还堪设想吗?”作者最后建议,报界记者应多抽点时间采访医学界专家,使社会大众所得到的新闻能更准确、更全面。^[53]这都反映了期刊较之报纸在防疫知识宣传普及方面的权威性、科学性。期刊以其规范严谨特点在防疫方面更受民众信赖和关注,所以不仅受众广泛,而且深受民众好评。一位叫邹庆方的患者曾给《麻疯季刊》编辑部写信,表达了感激之情:“今正月初七日,忽由邮递来贵会《麻疯季刊》一册,当即收下细读。感谢之情言不尽意。诸公志切救人,发此刊以资宣传,奔走呼号,不慕荣利,自甘牺牲,造福于人类,诚古今之伟举,万世之大功也。仁心济世,名副其实。……诸公真乃吾辈患麻风者再造之活佛也。”^[54]以普及中医卫生健康知识为目标的《健康医报》旬刊因“内容充实,出版准期,较其他医报为优”。有位读者深恐该刊受通货膨胀影响而停刊或延期,以至“影响医界精神食粮”,遂决定每月资助两万元,以协助期刊出版。^[55]期刊在民众间的信赖度和依赖感可见一斑。

期刊对民众防疫心态的批评对于提高民众的公共卫生意识,推动防疫观念更新,构建正确的防疫心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易景戴曾受政府委派参与了三次疫病救治工作,分别是1926年秋的霍乱疫情、1929年春的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和1930年的霍乱疫情。据其观察,民众对防疫的认识不断提高,表现了较高的积极性。他曾感慨地说:“顾前两届之成绩,较今岁诚不可以道里计。推原其故,实由于民智猛晋耳。……迨今夏防疫消息传出,霍乱预防液尚未购置齐备,而来院要求注射者,已日必多起。必院中开始工作,即纷至沓来,应接不暇。咸谓受三次注射,即霍乱之神莅临,亦可高枕无忧矣。”^[56]俞焕文在定县的观察亦如此。他说,种痘的场所多半在农家,而且大多是一二岁的婴儿,“工作的困难一年比一年少,然而被种的人数是一天比一天多”。^[57]1946年《上海时报》的一则报道也反映了民众对防疫所持积极的心态。作者说,在上海望志路、汉口路等地均排起了一

字长蛇阵,唯恐一旦疫起而注射不及。作者感慨道:当年法租界时期,为让市民打防疫针“追捕来拖了强打,有些还挨户注射”,抚今追昔,从“不要注射,强拉你注射”到“要注射了,没处注射”。^[58]民众从对防疫的抗拒到对防疫的欢迎,体现了其对防疫认识的转变,说明整个社会的防疫心态在不断发生变化。

民国时期的防疫工作不限于期刊普及防疫知识一项,政府部门防疫机制的建立,大众传媒的宣传介绍,科学团体的宣传教育及推动等,均发挥了作用。民国期刊普及防疫知识,体现了一定的系统性和综合性。换言之,民国期刊既重视普及的内容,也重视普及的方法策略,既做正面宣传引导,也做反面批评教育,还在字里行间传递了正确防疫心态和现代预防观念,进而引导社会大众在传染病面前重视个人品德和社会公德的养成。可以说,民国期刊刊发的大量批评民众错误防疫心态的文章,对期刊的防疫知识普及起到了很好的铺垫和补充作用,也对构建起良好的防疫心态和社会心态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

[参考文献]

- [1] 孟群. 序引 [J]. 唯生汇刊, 1931, 1: 3.
- [2] 胡勇. 清末瘟疫与民众心态 [J]. 史学月刊, 2003, 10: 73-78.
- [3] 张泰山. 民国时期国人对公共卫生建设的认识 [J]. 安徽史学, 2008, 5: 46-54.
- [4] 毛咸. 川流不息的疫症 [J]. 广西卫生旬刊, 1934, 2 (6): 1-3.
- [5] 伍连德. 医学杂志之关系 [J]. 中华医学杂志, 1915, 1(1): 1-2.
- [6] 行. 疾病与卫生 [J]. 文医半月刊, 1936, 1 (1): 8.
- [7] 编者. 本刊一周年的感言 [J]. 大众卫生, 1936, 2 (1): 1.
- [8] 敦吾. 答阳鹤琴先生 [J]. 广西卫生旬刊, 1935, 3(3): 1-2.
- [9] 林椿年. 发刊词 [J]. 现代医药, 1931, 1: 1-3.
- [10] 编者. 怎样普及卫生教育 [J]. 卫生杂志, 1935, 30: 1.
- [11] 林郁青. 担任救治沪西时疫工作之感想 [J]. 卫生月刊 (复刊), 1942, 1 (1): 10-11.
- [12] 二重. 治疗后之感想 [J]. 中西医学报, 1927, 9 (1): 18-22.
- [13] 拙夫. 乡村中的公共卫生 [J]. 黄县民友, 1935, 3(29): 1.
- [14] 郭志坚. 为什么吾们要救济麻疯? [J]. 麻疯季刊, 1927, 1 (3): 1-3.
- [15] 毛咸. 怎样救济广西的麻疯病 [J]. 广西卫生旬刊,

- 1933, 1(11): 1.
- [16] 毛咸. 救命[J]. 广西卫生旬刊, 1935, 2(32): 1-2.
- [17] 体. 烟幕弹中的卫生[J]. 广西卫生旬刊, 1933, 1(1): 6-7.
- [18] 胡宣明. 世界公共卫生之演进与中国公共卫生之建设[J]. 广西卫生旬刊, 1935, 2(31): 1-4.
- [19] 克西. 信都种痘记[J]. 广西卫生旬刊, 1935, 2(35): 21-24.
- [20] 蒋木沂. 为什么要打防疫针?[J]. 民众医药汇刊, 1934, 1: 105-106.
- [21] 丁振. 打过防疫针后的小林[J]. 上海儿童, 1938, 1(13): 16-17.
- [22] 谭世鑫. 结核常识[J]. 防痨, 1934, 1(2): 67-76.
- [23] 汤书年. 痨病之预防[J]. 防痨, 1934, 1(1): 12-15.
- [24] 邹志坚. 痲疯院是一待毙所吗?[J]. 痲疯季刊, 1933, 7(2): 1-3.
- [25] 傅乐仁. 痲疯问题及其解决方法[J]. 卫生季刊, 1925, 2(2): 21-27.
- [26] 去病译. 痲疯病的传布[J]. 痲疯季刊, 1933, 7(3): 21-22.
- [27] 马济翰. 传染病预防法[J]. 康健杂志, 1936, 4(6): 15-18.
- [28] 李兆璋. 平凡的, 也是严重的[J]. 防痨, 1934, 1(2): 99-102.
- [29] 邹志坚. 中国的痲疯问题与本国今后之计划[J]. 痲疯季刊, 1927, 1(2): 1-6.
- [30] 慈生. 一般治疗的重要性[J]. 健康知识, 1937, 1(4): 1-3.
- [31] 华伦完德. 广东清远痲疯福音船[J]. 痲疯季刊, 1927, 1(1): 36-37.
- [32] 东北一带疫症肆虐未已[J]. 广西卫生旬刊, 1933, 1(20): 15.
- [33] 肺病疗养院健康教育的实施[J]. 公共卫生月刊, 1936, 1(11): 30.
- [34] 沙古山. 春令卫生谈[J]. 广西卫生旬刊, 1935, 2(30): 9-10.
- [35] 古莽. 春令卫生谈[J]. 广西卫生旬刊, 1935, 2(31): 9-10.
- [36] 王普乐. 教会医院及公共卫生[J]. 卫生季刊, 1924, 1(1): 26-29.
- [37] 马志超. 对廿一年虎列拉流行的所见到一段感想[J]. 陕西卫生月刊, 1936, 2(6): 40.
- [38] 庄憩樵. 述湿瘟症误治致死一例[J]. 现代中医, 1935, 2(11): 11.
- [39] 迷信妖巫之结果[J]. 新乡村, 1934, 1(2): 81-82.
- [40] 记者. 对于防疫之感言[J]. 时事周报, 1932, 2(18): 1.
- [41] 宋忠钰. 国民应有卫生和医药的常识[J]. 卫生杂志, 1935, 24: 1-2.
- [42] 秦赓荪. 病家应慎重延医服药说[J]. 中华全国电政同人公益会会报, 1927, 20: 12-13.
- [43] 马天放. 丁老八和他的儿子[J]. 痲疯季刊, 1927, 1(2): 31-36.
- [44] 沙古山. 有病不可乱投医[J]. 医事月刊, 1923, 1: 1-4.
- [45] 周毓甫. 滥服成药及不慎延医之弊害[J]. 国医正言, 1934, 11: 9-11.
- [46] 余鸿仁. 中医之自觉[J]. 现代中医, 1934, 1(2): 17-19.
- [47] 麦雅谷. 中国的痲疯问题[J]. 痲疯季刊, 1934, 8(1-2): 6-10.
- [48] 平市误传睡疫[J]. 新医药杂志, 1935, 3(10): 910.
- [49] 范行准. 谣言与医学[J]. 医文, 1943, 1(3): 1-2.
- [50] 孙小鸥. 预防可怕的疫病[J]. 上海儿童, 1938, 1(13): 10-11.
- [51] 周希文. 死里逃生记(鼠疫)[J]. 民众周报, 1937, 3(6): 24-28.
- [52] 宋应离、袁喜生、刘小敏. 20世纪中国著名编辑出版家研究资料辑(第4辑)[M].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5, 334.
- [53] 姜筠. 关于痲疹新闻的纠正[J]. 现代中医, 1935, 2(4): 1-3.
- [54] 邹庆方. 来函选录(其五)[J]. 痲疯季刊, 1927, 1(2): 53-54.
- [55] 热心读者来函之一[J]. 健康医报, 1947, 1: 41-43.
- [56] 易景戴. 我之防疫谈[J]. 社会医报, 1930, 123: 1100-1102.
- [57] 俞焕文. 定县种痘七年经过[J]. 民间, 1936, 3(15): 4-7.
- [58] 一字长蛇阵竟打防疫针[J]. 上海时报, 1946, 1: 8.

[责任编辑 王大明 柯遵科]